

方修編  
散文集

馬華新文學大系（七）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方修編  
馬華新文學大系  
(七)  
散文集

\* \* \* \*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星洲大坡大馬路二〇五號

吉隆坡·檳城世界書局總經售

\* \* \* \*

1971年4月第1版

1971年4月香港第1次印刷

印數：初版1000 F. 字數：502,300字

印張：31''×43'' 13.08

開本：6''×8'' 1/25 書號：S.U. 7006

\* \* \* \*

全套十冊定價港幣伍百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導言

方修

## (一)

散文是馬華新文學中最早誕生的一種文體。一九一九年十月起，隨着馬華新文學史的發端，它就以戰鬪的姿態出現。其中最活躍的是政論散文和雜感散文，作品散見於各報的「時評」，「社論」，「來件」等專欄以及新聞版，副刊版等。而政論散文比起雜感散文來尤顯得更成熟，更豐盛，差不多成了馬華新文學萌芽前期（一九一九——一九二二）的散文寫作以至各種文學創作的主流。

這個階段的政論散文何以特別發達呢？原因之一是當時中國的辛亥革命已經顯著失敗，南北分裂，軍閥跋扈，列強乘機擴大侵略，國事蝸蟻，達於極點，星馬華人普遍地關心政局，傷時憂國，因而政論的閱讀與寫作，乃蔚為一種風氣；作品寫的也多是真情實感，深切動人。

另一原因則是政論散文雖然與其他散文樣式同屬雜文學作品，但比起抒情散文，紀事散文，甚至雜感散文來，形象思維的成份又少了些，寫作技巧的掌握容易了些，這也使到它成了馬華新文學發展初期的一種最熱門的寫作樣式。加以各報館的編輯人員，由於職務關係，也以撰寫政論為

主，而這些人又是當時的比較成熟的寫作人，所以早期的政論散文質上量上都較其他的散文作品突出了一些。

這時候的政論散文的作者，可以林耀生爲代表。林氏的作品大多發表於叻報的「時評」欄，也有一部份見於新國民日報的「社論」欄，內容主要是針對着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政治的腐敗，封建軍閥的禍國殃民等等痛心疾首的現象，發爲猛烈的抨擊。有時還進一步批評到一般革命黨人的軟弱作爲，不滿他們與反革命勢力的妥協。例如，在「昨天的紀念」中，他指出，所謂共和政體成立紀念，南北統一紀念等等，乃是令人哀痛的日子；是袁世凱、段祺瑞等軍閥武夫得意揚眉，全國人民大眾失望流淚的紀念；是孫中山，黃克強，李烈鈞，胡漢民等國民黨領袖思想軟弱、行動錯誤、革命不徹底的结果，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

當時本地的一些比較進步的政論作者，如張叔耐何秀暢等，批評時局，多唯國民黨領袖的馬首是瞻，亦步亦趨，林氏能夠站得更高一層來看問題，這是他的作品最大特色。（當然，林氏這時還未能了解辛亥革命的失敗以及國民黨的向封建軍閥妥協，主要的是孫中山等人所代表的整個中國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荏弱無力所使然，並非個人的決策上的問題。這一點可以說是時代的局限。）

林氏對於當時一些反動言論的駁斥，也始終不遺餘力。例如，有人譴責青年學生鼓吹新思潮，說是「民氣囂張」，必須按法懲治，林氏嚴正駁覆道：中國的民氣，已是九分死了，只有學生尚保存一分生氣。他們的行爲是愛國行爲。一些軍閥政客如張勳的復辟，張敬堯等的私賣礦產，曹汝霖等的密訂賣國條約，李厚基等的殘殺禁錮學生，倪嗣冲軍隊的姦淫婦女等等，才是越軌囂張的行

爲。要懲治越軌驚張，就先要懲治此輩。

林禪生的寫作活動基本上止於一九二二年底，政論散文之作爲早期馬華新文學作品的主流，也差不多是到此爲止。原因是，第一，由於文藝園地的演變，本來以「時評」欄及綜合性副刊作爲支柱的馬華文壇，一九二三年以後已經轉化爲以綜合性刊物及文白混雜的純文藝副刊爲主體，於是政論散文本身也開始了分化。時間性、邏輯性較強的留在「時評」欄，成爲較爲純粹的時事論文；文學性、哲理性較濃厚的則轉入了副刊版，成了雜文或文化問題的評論，加強了副刊的內容。

其次，由於小說創作的增加，戲劇文學的出現，有許多問題與思想主張的提出，便由這些新的文學樣式分擔了一部份任務，政論散文的重要性乃相對的減低。同時各報的時評社論也漸漸規定了專人撰寫，減少接受投稿，因而這方面的作品也不像前此那麼的多姿多采了。

這樣，一九二三年以後，馬華新文學創作成績的重點就不再是政論散文；馬華散文作品也不再是以政論散文爲主流，而是向其他的散文樣式發展，其中較有成就的是記事散文。

馬華新文學萌芽初期，雖然已有不少的記事散文出現，但都相當淺陋，常常是寥寥一二百字的速寫或素描，寫些瑣碎的街頭見聞，諸如紅燈碼頭的人力車夫爲了拉客而大打出手，哥哥釘梢追女人結果卻發現那原來是自己的妹妹之類。到了一九二三——二五年間，記事散文的形式，乃稍爲完整，有了對於個人的生活經歷以至南洋的民情風俗的較細緻的描寫，一些記述當時中國以及南洋地方下層社會的生活故事的作品尤其值得一讀。這些作品有許多是以小說的名稱發表於當時新國民日報的「小說世界」，爲的是要適應該刊的要求，實則都是記事散文的性質，應該視爲散文作品。這裏真可以玉貞的一篇「人間地獄」爲代表。

此文敘述作者於晚唐後和朋友們去逛遊藝場，見一婦人帶着兩三個孩子在求乞，詢問之下才知道這是一齣新的「琵琶記」。原來她的丈夫王老三，四年前因為故鄉治安動盪，土匪橫行，迫得南渡謀生以後，一直不見寄回隻字分文。最近她放心不下，借了船費，南來訪尋，不料王老三早已在南洋另立家室，遺棄舊人了。——這齣悲劇，可以說是後來很多「海外尋夫」一類的電影或小說創作的先河。

此外如新曉的「回憶」，反映軍閥混戰之下許多中國婦女「一夜新娘，終身寡婦」的悲慘命運；雪樵的「夜半哭聲」，寫一個職工因勞碌過度咯血而死，都是較有內容的記事散文。

抒情，寫景，以至側重心理分析的散文作品，這個時候也都已出現了，但一般上還是相當稚拙；雜文雖然頗為發達，思想深刻理論精確之作卻仍不多，成績同樣趕不上記事散文。

## (二)

雜文的第一次豐收是在馬華新文學擴展初期（一九二五——一九二六）。譚雲山是這個時候最重要的一位雜文作者。他的作品大多發表在他本人主編的「星光」副刊上面，內容帶着濃郁的感情色彩，對南洋社會的閉塞風氣展開強烈的批評。在他以前的馬華雜文，有的偏重談論中國問題，有的雖然涉及本地社會現象，卻很少能夠接觸到問題的實質。譚雲山的出現終於改變了這種情況。他勇敢地干預生活，面對現實，表達了在當時的馬華文藝界來說幾乎是最先進最深刻的思想觀點。「南洋華僑教育的朕兆」一文最能夠說明他的這一特色。

該文評論當時華僑中學學生的「驅長運動」，力排衆議，認為這是南洋教育事業的佳兆。因為

南洋的教育界太過沉悶了，不能養成隆盛的民氣，蓬勃的生機，只能培養出專制壓迫下的愚民，對國家對人類都無益處，作者主張學生要有反抗的精神，才能促使教育工作者認真辦事，檢討缺點，不斷改進。他最後大聲疾呼：「學生諸君呀，我很歡欣地恭祝你們的反抗，恭祝你們的努力，恭祝你們前途幸福，勝利！」

除了雜文之外，記事散文在這一階段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他散文樣式也都漸臻成熟。「星光」同人的努力標誌着這方面的成就。鄒子孟，段南奎，了因，華國……等分別推出了一系列敘事、記遊、寫景，或抒情的散文作品。

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的新興文學運動中（一九二七——一九三一），馬華散文的發展卻又放緩了脚步。因為這時期先後出現的許多優秀的新興文學作者，如槐才，海若，慧聆，浪花，依夫，梅子，海底山，寰遊，靜倩，細胡等等，幾乎都把他們的才能傾注到小說、詩歌、或話劇創作方面去，留下來的散文佳作反而不多。比較致力於散文寫作而顯得突出點的，算來也只有「一工」，孫藝文，古月等三幾人而已，而且都是屬於雜文作者。

「一工」的雜文代表着新興文學思潮濫觴期間（一九二七——二八）的散文的成就。他的作品大多刊登於檳城南洋時報「荔」的「說涼話」專欄中，內容常常是在貶諷當時殖民地的一些愚民措施以及一班幫忙與幫閑的人物。如「博士敬進教育言」一篇，作者譴責林文慶在星加坡中華俱樂部歡迎英國殖民部長奧氏宴會上向英國政府出謀獻策；指出林氏所謂「環境不同，不應以治人民族之教育施之於被治民族」，實際上就是要英政府勿讓殖民地人民懂得有所謂自由人權、平等待遇的道

這原故是，苟以治民族教育，教育被治民族，環境不同，則至少自由人權，平等待遇那些話頭，就將使受之者頭大如缸，教之者力竭聲嘶了。……況且，教育所沐，萬一被治民族也起了一個念頭，想嘗其自由平等的滋味，爭求着新的環境，真豈不「信一難題」嗎？

又如「旺相可風」，則是揭露了當時檳城官委議員宋旺相的「業績」。事緣英王誕辰，頒賜宋旺相以有功勳章，由檳城總督克利佛爵士代為發給，克氏在致詞時盛讚宋旺相學問湛深，經驗宏富，「誠殖民地華人社會中最有名望的領袖，華人感受其恩惠」；而且不但才高，尤饒膽量，「於一九二一年左右，曾因提出公論，以後接到恐嚇信件，但卒無損」。所謂「提出公論」云云，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呢？作者指出：宋氏於一九二一年履任之後，「大概就是碰着華校註冊爭執的事情吧，則僑胞公意，卒賴宋君之力而打消之，誠哉「華人感受其恩惠」了。」

一工的作品簡短，含蓄，甚至有點晦澀。原因是當時新興文學正在發軔，言論統制的壓力相對強大的緣故。

孫藝文的風格則與一工相反。他是新興文學運動高潮期（一九二八——三〇）的散文代表作者，作品開濶明朗，鋒芒畢露。一九二八年年中新興文學運動正式發難時，檳城南洋時報「混沌」附刊的創刊辭「混沌初開」，就是他起草的。該文說，「混沌」是逆子不肖孫的逋逃藪。他們的祖父是欺騙虛偽團的首領，父親是殺人不眨眼的摩天嶺寨主。兒孫們被諭令執行恐怖政策，推行黑化主義，犧牲多數人，利益少數人；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勞而不得食，不勞而豐食。現在，兒孫們都背叛了先輩，脫離了家庭。他們宣言：他們愛他們的先輩，但更愛大眾朋友；他們寧願被罵不



孝不肖，卻要對得起良心，要澈底暴露那騙人殺人的營寨的內容，促使大眾朋友起來防禦與反抗！這簡直就是一篇新興文學運動的檄文。

孫氏較後出任檳城新報的主編，執筆更加勤快，所作多登在該報的「社論」與「來論」專欄，署名隻眼，小萍等等。與孫氏處於同一階段的較優秀的散文作者，有楊質夫、白丁、靈芝、賴鬪夫、愛底山、藝草等，作品散見於檳城新報、中南晨報，及叻報的副刊，但都不及孫氏那麼多產與傑出。

古月是新興散文行列的一位殿後作者。他在新興文學運動的退潮期中（一九三一）仍然堅持着鮮明的新興立場，筆鋒的犀利幾不下於孫藝文；例如他對於當時因徐志摩之死而引起的一片哀悼之聲的批評——

徐志摩先生對於勞苦大眾的位置怎樣呢？諷之黃包車夫，他們說「天曉得」；諷之一般工人羣衆，他們說「阿拉勿懂格」；諷之農民，他們則謂「曉得伊是東洋老還是西洋的赤佬？」諷之前進的青年學生們，情形更爲不遜，齊說：「丟那媽，他常常罵我們撒野呵」。

……

你說人們的心腸好，徐志摩因飛機跳舞喪命，都有人哭喪着臉。然而中國民衆在中外屠殺之下，血淋淋的頭顱像萬球亂滾，我們的詩人都視若無睹。

你說人們真的爲中國文壇而哀悼死了這末一個徐志摩其人。然而不知幾多青年作家斷脰決胸的死於殘酷的慘無人道的誅鋤，也並不聞有什麼詩人（和徐先生同道的）曾呼過半句！但這畢竟已是新興散文的尾聲。接下來，馬華文學的發展晉入了低潮時期，就一連好幾年無法

看到這麼一種剛正硬朗的作品了。

新興散文的創作成績，與當時同一思想系統的其他文學樣式比較起來可說不是很理想的。但新興文學運動演進期間的其他文藝流派，其散文作品的收穫却是更加的貧乏。

先說三個提倡南洋色彩的文藝小組——「荒島」同人，「文藝三日刊」同人，及「椰林」的陳鍊青張楚雲等。

「荒島」的幾位同人——黃振彝，朱法雨，張金燕，鄧勵誠（L S女士），其中以主編黃振彝最擅長散文寫作。但他寫得較好的都是一些中國題材，真正具有他們所標榜的「南洋色彩」的作品卻不見佳，譬如提倡「商人文學」等等，思想的雜質是很多的；勉強說來只有「詩人東來」一篇有些特色。文章大意是說詩人奉戈爾前些時訪問上海，見到工廠矗立，不禁悲從中來，感覺得「Very Sad」。現在對着恆河兩岸烟囪疊疊，恐怕要Sad之又Sad，愁上加愁了。而馬來半島的工廠雖不若恆河兩岸多，卻也充滿了歐洲物質文明的空氣，想來更非詩人遊玩的理想所在吧？——作者在這裏預示着：泰戈爾要以詩的和平情緒來改造世界，打破物質文明對於人類的束縛，卻又不欲干預生活，那終歸是一種幻想的。

「文藝三日刊」同人在發刊「洪荒」（一九二七——二八）的時期，原是唯美主義的倡導者。他們的重要成員如曾聖提，曾華丁，花都蓉女，丁琅（拙著「馬森新文學史稿」誤為曾聖提筆名），張放，林革塵，王元良，李克希等，寫的大都是一些雍容華麗，刻意雕琢的散文，內容則空洞地強調汎愛，智慧，人道，和平，人類的原始的熱情；或者掛象地詛咒現社會的庸俗，人世間的醜惡等

等。例如花都蓉女的「靈的覺醒」，呼籲讀者要「熱愛人類」，「爲情而死」。他說：「我們不是爲憎恨而生，……我們應該無憎，但不應該無愛，……我們應該愛人，人間不愛我們，我們也應愛人間」。這就是這一批唯美主義作者的樣板作品。後來他們創辦「文藝三日刊」，提倡「鑄造南洋文藝鐵塔」，但主要的表現只是限於小說方面，散文作品（詩歌也然）始終是「洪荒」時候那一套，無甚進步。

陳鍊青及「椰林」初期的一批作者，雖然力倡「創造南洋文化」，與「文藝三日刊」同人的號召「鑄造南洋文藝鐵塔」桴鼓相應，然而隨着新興文學運動的高漲，「椰林」副刊終於成爲新興文運的一個重要堡壘，他們的作品也受到深刻的影響，新意識漸次加強，以至稍後的一些寫得較好的散文已經突破了所謂南洋色彩文藝的範疇，變得接近於新興文學。例如陳鍊青，他在「天堂」中明白指出：「天堂是一個陷阱，它引誘窮人低首下心地做奴隸。它引誘窮人離開現實，追求空虛，把一切反抗力全由那天堂誘惑的波濤捲到海心裏，一心一意只要死後享受靈魂的幸福。呵，無聊而且酷毒的天堂，從古及今，埋盡了幾多做人間牛馬者的反抗性！」

又如，連嘯鷗的「弱者的叫喊」，寫一個飢餓的弱者，從十字街頭走到闊人的大廈的窗前，狂叫着，要布爾喬亞還給他搶去了的麵包，然而沒有人理睬他。闊人們甚至把他當作瘋子或歹徒，要打死他。終於，他餓暈了，倒在地上死了。但靈魂卻脫離軀壳，出而游蕩，遇到一個世故老人。老人遞給他一冊「貧民字彙」說：「這就是你的命運」。原來裏面都是「鞭撻」，「凌辱」，「饑餓」，「凍餒」，「勞苦」，「疾病」一類的字眼，就只沒有「幸福」二字。他放下字典，看看四週，發現四週都躺着和他同樣命運的人；再望望天上，卻見上帝在搖頭嘆氣，束手無策。

嚴格說來，這類作品應該記入新興散文的賬上，算不得南洋色彩文藝的成績。

除了上述三個文藝小組合外，這期間其他方面較受注目的散文作者，則有「綠漪」附刊的何采菽，「繁星」的紹者林仙嶠，「公共園地」的編者景三等三幾位。

何采菽是感傷的浪漫主義一派的代表作者，從「綠漪」(一九二七——二八)發刊前後以至他自己創辦「昶旭」(一九二九)的時期，寫的都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之類的失業流浪的哀吟，但許多散文作品都無法超過他那篇自傳性的小說「醫院中」。林仙嶠則擅寫議論性小品，全部登在他所主編的「繁星」(一九三〇)上面，文筆的清新暢達較之思想內容更爲可取。情形比較複雜的是景三(馬蝶影)。

景三主持下的國民日報的「公共園地」於一九三一年初擴大篇幅，充實內容，與檳城光華日報的「戲劇」與「蛻變」並爲新興文學退潮階段的馬華文壇的支柱，不時出現一些比較堅實的創作。景三本人也在該刊發表大量的雜文。但他的雜文卻充滿了雜質，尤其是起初的幾個月，幾乎是「公共園地」裏面最不光采的作品。他的意識和馬華新文學思潮差不多是完全對立的，他對於新生的事物一點也沒有好感，是截至當時爲止的一些知名的馬華新文學作者中最落後於時代精神的一個。例如，一九三一年四五月間，怡保公立女學，檳城幼稚園，星洲華僑中學等，不知發生了些什麼事件，他就寫了一篇「算是什麼感」，借題發揮道：「五四運動以還，出於一時憤激的青年學生，因爲濫行參加各種活動，而把固有的學業荒廢下去，日惟從事於團體的組織，和選舉的競爭，不求實際的學問。所以知識能力喪失，盲從附和，就屢屢被人用作政爭的工具，這已是違背運動的本旨了。而其中間，又復濫用權利，干涉校政，因之罷課之風潮，便不斷顯現於我的眼簾」。又如，當時

南洋地方有些青年職工在遊行演講，紀念勞動節，他就寫了一篇「五一」，斥為「思想淺薄」，旨從衝動」，沒有認清三民主義的「光明的正道」。

直到「一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景三的筆鋒始與「公共園地」的一般作者顯得比較協調。他大力抨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東三省以及世界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公共園地」因鼓吹抗日關係，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日起被令停刊旬日，景三在該刊停刊前寫了一篇「在未停筆以前」，更是文情並茂，成了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在東北事變之後，竟能得到一般愛國青年的同情，引吭高呼，把沉寂的空氣頓時衝破，這是多麼值得讚嘆的一回事。……可是，事變之來，竟有非你所能逆料者。於是我感嘆，我悲哀！我痛恨我人何不幸而生於這時代，更何不幸而生為弱小者？我復有何言可說哉？我只  
有嗚呼而已矣！……

然而景三終究未能為馬華散文作品提供更好的貢獻。因為「公共園地」於十二月初復刊以後，馬華新文學擴展時期便隨之結束；過了不久，他就回上海去了。

### (三)

馬華新文學的低潮時期（一九三二——三六），小說方面出現了許多新的舊的鴛鴦蝴蝶派的作品，詩歌方面出現了大批的形式主義的什篇，散文部門也相應地產生了多量的林語堂式幽默閒適的小品以及由此發展開來的題材煩瑣，油腔滑調的「雜感」。

幽默閒適的小品散見於一九三四年前後的星洲日報的「晨星」副刊及其姐妹刊物如胡浪漫，馬

康人等先後主編的「繁星」（晚版），胡戍女主編的「遊藝場」（星期刊）。「繁星」及「遊藝場」等側重幽默，「晨星」則愛好閒適。諸如黃杜殘的「不齋閒談」，陳鍊青的「觚不觚夜話」禹礎的「秋蟲隨筆」，頌聲的「農村消夏錄」，以及其他作者的「廬陵橋夜話」，「屠狗齋聯語」，「雨絲風片錄」等等，大都是林語堂的「人間世」等雜誌影響下的產物——所謂情調閒適寧靜的作品。這種閒適情調有時也用韻文來表現，如下列的一首「消暑」（阿樵）——

小齋有暇時

天熱不許睡

人自無聊神自疲

又獨自嘆氣。

悶熱苦煞人

風吹無涼意

問天幾時才斂威

蟻民免熱死。

天熱光陰遲，

怎遣此？

閒翻「十日談」

細閱「人間世」

披論語

不覺夕陽已掛石榴枝。

（一九三四年四月，邦略）

從這首「詩」中，我們也可以見出，「論語」「人間世」等讀物，那時候是如何地在毒害當地的文風了。

至於油腔滑調的「雜感」之類，則比較集中於李鐵民（一九三三——三四）及李紫鳳（一九三五——三六）先後主編的南洋商報的「獅聲」副刊。李鐵民本人的思想傾向是不錯的，文章富有傷時憂國的感情，但卻是屬於舊式讀書人，才子氣太重，選稿不認真，因而登出了很多低級趣味的文字，有些散文滲雜着打油詩，更顯出十足的才子加流氓的氣味，連天花癩疹也成了他們嘲笑的對象——

一個女學生

肉感加摩登

可惜一件事

毛兵！

——唐山答答：「不是隨筆」

到了李紫鳳接編「獅聲」，這類太過露骨的捉狹無聊的東西，算是減少了些，但瑣屑浮滑的實質並無改變。李紫鳳本人的文章就是一個典型。例如，他看到中國有人在提倡「老人結婚年」、廣州又有所謂「選舉耆英」等新聞，就寫了一篇「老當益壯」，說什麼現在摩登女性過剩，戀愛場上應該增加一批黃忠老將，使之供求相應云云。

嚴肅，踏實地耕耘着這個時期的馬華散文園地的作者，也和其他文學樣式一樣，先後出現了兩小批。第一批可以絲絲、黎陞、天白爲代表。這些作者的寫作活動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七年以後，但重要的是他們出現於馬華新文學低潮時期的前半期（一九三二——三四），適時地填補了這一階段的正派的散文創作的空白。檳城新報的「輪」和光華日報的「橫風」是他們發表作品的主要地盤，寫的大多是一些針貶時弊的雜文，如絲絲的「秦檜的進步」，論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後，清廷割讓了台灣等地，引起康有爲等「公車上書」運動，彷彿「九一八」事件發生後中國各地大學生的入京請願。作者指出四十年來國政毫無改善，但四十年來秦檜之流却是大有進步——

當時的秦檜尚畏河辭位，今日的秦檜——無抵抗主義者，就沒有那麼猷。他不畏河，更不辭位。你們學生如果太「跋扈」了，就給你們一個「反動」的罪名，包管你們受不了。傾向上接近於這一個散文行列的作者，則有陸樊、劉郎、曾見、饒楚瑜……等。

這時期的第二批較嚴肅的散文作者，是一九三五年前後崛起的一些新人，包括子遺、潤湖、林棘、斧夫……等。他們的作品也與同一階段（馬華新文學低潮時期後半期）的詩歌小說一樣，內容常常出現一些叛逆性的形象或新生的思想。譬如斧夫的「掙扎」，寫青年古克辛失業潦倒，但意志不衰，每日磨斧砍柴，維持着一妻一子的生活。朋友勸他投函應徵教員，他知道這是騙人的玩意兒，已經上過幾次當，再也不願意去浪費精神了。而且由於每日砍柴勞動，精神體魄，愈鍛鍊愈堅強，愈有信心於剷除侵略者，開闢新社會的大業……。又如子遺的「一件小事」，刻劃一個鄉村少年（拉讓）的倔強的、叛逆的性格，也很成功。



馬華新文學繁盛期（一九三七——四二）是馬華散文全面成熟的時期，記事、抒情、說理……各種體裁都在這時候充分的發展。此外還有一些新的文體如報告文學、文藝通訊等的興起，加以作者陣容鼎盛，各展所長，因而呈現了百花爭妍，多姿多采的壯觀。當然，基本主題還是抗戰救亡，以及戰時人民生活面貌的描寫。

這時期的馬華散文，由於許多寫作人的出現的先後，留馬的久暫，以及所受前後期抗戰局勢演變的影響種種關係，在不同階段中各有其代表性的作者作品。大致說來，在抗戰文學運動前期（一九三七——三九），以丘康（天白）、陳南的雜文，葉尼、紫籛的報告，云覽、修慧、葉冠復的記敘散文……等為重要的收穫；到了後期（一九四〇——四二），則以郁達夫的政論散文、蕭魂、漂青……等的記敘散文較為出色。

丘康的雜文廣泛地談論社會、政治、文化問題，明白暢曉，富啓發性。其剖析文學問題的一部份，尤為精彩，時有深刻獨到的見解，在文壇上起了一定的指導作用。例如魯迅逝世前後以至抗戰爆發前夕的上海文壇，思想上頗形紊亂，南洋文藝界一度表現出無所適從的狀態，但丘氏卻幾番為文指出：左聯後期實際已失去正確的領導。「南洋甚至是中國初來的不少文人，一說到左聯就好像奉為聖旨，連一班和田漢打成一片的作者，也認為是真實的領導者，這都是非常錯誤的。左聯縱然還存在，它的性質也不過是羣衆組織，這是不能和領導機構併為一談的」。他認為魯迅的道路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是完全正確的。（「論中國傾向作家的領導」，一九三七年六月